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葛继勇¹, 施梦嘉²

(1. 浙江大学 日本文化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2. 浙江大学 亚欧系,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关键词] 关帝信仰; 东传日本; 演变; 影响;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5-0072-08

中国的神祇千般百样,但所受的崇奉却并不一致。“某一尊神明是否受到民众的隆情盛礼,只要看看庙宇的普及程度、档次以及香火的盛衰,就可以有大致地了解。依此可以断定:关帝庙及其香火不是位居榜首,最起码也在前三名。”^[1](p.195)幼时,笔者爱听脍炙人口的评书《三国演义》,对“玉泉山关公显圣”深有感触;几年前,曾见某杂志报道海外华人的生活与信仰诸习俗,其中就提到关公在域外华人中的影响;近日还发现,绚丽辉煌的关帝庙赫然出现于日本新偶像电视剧《正义必胜》中。关羽这一红脸美髯的大汉,竟然超越时空,远涉重洋,历经唐宋元明清而进入21世纪,伴随炎黄子孙在高耸的摩天大楼与立体影视的异国“安身立命”,不能不牵动人们的神思。

据笔者管见所及,专以研究关帝信仰在日本传播的论著,仅有童家洲先生的《试论关帝信仰传播日本及其演变》^①一文,该文以日本横滨、神户两地为中心阐述了关帝信仰在日本华侨社区的演变过程,分析翔实,着力甚勤,可谓开山之作。然作者认为,关帝信仰存在的缘由是旅日华侨“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出于心理上的共同需要”,日本的关帝信仰“在17世纪20年代由中国商人携入”,颇有可商榷之处;且该文仅论及长崎、横滨和神户等华侨社会中的关帝信仰,涉及面不宽,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此,笔者试从关帝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出发,阐述关帝信仰的演变及其在日本的流播,并围绕关帝信仰的传播时间、途径及对华侨社区以外的日本民间信仰的影响等问题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收稿日期] 2003-01-1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葛继勇(1975-),男,河南汝南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2. 施梦嘉(1976-),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亚欧系教师,主要从事日本语言教学与研究。

^① 载《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24-31页。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2月9日至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参加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涿州举行。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卢晓衡主编)中无一篇论及关帝信仰在日本的流播,登载的《关羽目录》(收录至今为止研究关羽的论文、著作)中,仅有一篇谈及关帝信仰在朝鲜半岛的流播,即日本学者中村荣孝的《朝鲜における关羽の祠庙 藤羽について——壬辰·丁酉倭乱と「关王庙」の创始》(《天理大学学报》1973年第24卷5号,第85页)。

一、关帝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关羽,字云长,后世尊称为关公、关帝,河东解州(今山东临猗县)人,三国蜀汉大将,公元219年被东吴擒杀。自三国两晋六朝以迄隋唐,其灵异无多,除了在荆州等个别地区之外,影响甚小。唐时或有记载,民间称之为关三郎,视其为与鬼神有联系的凶神。宋元的《说三分》、《三国志平话》及一些与“三国”有关的杂剧中,关羽的形象有所改变,由一个令人敬畏的凶神成为社会大众广为接受的正面人物,其地位也有所上升[2](p.44)。后依仗罗贯中《三国演义》,关羽又成为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名震儒释道三界的英雄人物。被重塑的关羽形象深入人心,关羽拜祀不仅在官方祀典中地位上升,而且普及至一般民众。清王侃《江州笔谈》载:“《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令天下莫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关羽喜好《左传》,讽诵上口,言行合乎儒家经义,被尊为与孔子“文庙”相映且分庭抗礼的“武庙”主神;关羽“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的封建人生观,深为道教所标榜,《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等通俗劝善文极为盛行;佛教徒则于常见的十八罗汉旁塑关羽像供奉^①,《佛祖统纪·智者传》更记载了关羽显身、从智者大师受五戒的故事。关帝信仰既有道教的属性,又有佛教、儒教的属性,它体现了儒、道、佛三教混合信仰的宗教观。关帝从历史上的真实英雄崇拜,转而为儒、佛、道并尊,并在历史发展形式驱动下逐渐被造就为神的最高主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人神关系的某些底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3](p.49)。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朝廷赐号“伽蓝神”作为关羽敕封,于常见的十八罗汉旁塑关羽像供奉。《佛祖统纪》著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由此可知,在当时关公已受天人共戴、儒佛道并尊。深受其益的后主刘禅不过追谥关羽为“壮缪侯”;而内忧外患的宋朝封其为“忠惠公”、“义勇武安王”;至蒙元更加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清之际,似乎感到公、王皆不足以资号召,明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满清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且每年致祭,备加尊崇。直至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公布神祠存废标准时,也保留关帝神祠。在民间,关帝被誉为“万能之神”——司福祿、佑科举、治病消灾、驱邪辟恶、诛叛伐逆乃至招财进宝、庇佑商贾,深受民众信奉。明刘侗,于奕《帝京景物略》曰:“关庙自古今,遍华夷。”至清,由于历代皇帝信奉关帝,关帝的信仰遂流播于今东北(满洲)各地。清至民国,北京城里专祀关帝和祭祀关帝为中的庙宇竟有116座,台湾岛有160座。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列出关帝所保护的行业达22个,涉及皮革业、盐业、屠宰业、典当业及教育业等。五月十三日(传说关帝诞辰日)祭祀关帝,乃明清祀典所规定,《续文献通考·郡祀考三》云:“岁五月十三日,祭(关帝)以太平果品五帛。遣太常寺官致祭。国有大事则告。”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五月)十三为单刀会,是日多雨,谓天赐磨刀水云。”《大同县志》还载有五月十三日抬着关帝像,随“架戏”游行。民间求雨、械斗无不求助于关公,门画、甚至连婴儿摇篮上的辟邪牌也是关羽画像。

关公与曹操体现的“买卖不成仁义在”的商业准则,也深受城镇的行会团体尊崇。或以出生地的同乡组成中心,或以同一地段开设店铺组成邻保体制而形成的同业行会,华人们多选择关帝作为一种共同的信仰、联合的纽带,在行会的事务所祭祀关帝。经过历代的传承,这种意识积淀为手工业者和商人稳固的文化心理。海外华人的关帝信仰正缘于此。以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为例,称为积善堂的关帝庙成了华人行会的事务所,以便灵活地将同乡和祭神结合起来。台湾地区和香港的居民也保留着对关帝的浓厚信仰。台湾关帝庙最多,如17世纪兴建的台南关帝庙,颇负盛名的台北行天宫,规模宏伟的日月潭文武庙,以及新竹市近郊建造的高达数十公尺的关帝像等。甚至连选举事务所的神坛、警察的制服都饰有关帝神像,信奉关帝的不仅是成年人,为升学考试来许愿的少男

^① 杭州灵隐寺十八罗汉旁塑有关羽像奉祀。参见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8页。

少女也大有人在[4](p.7)。关帝已不只是武神、护国神、寺庙的守护神,而且也是使商人发财致富的财神和保佑学子升学的学问神!关帝信仰也跨越时空,流播域外,影响近邻的周边国家。蒙古乌兰巴托、越南河内、韩国汉城、缅甸猛拱、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都曾发现有关帝庙,在美国夏威夷的华人社会里也存在着关帝信仰。关帝庙从朝到野,从国内到海外,传布甚广。但关帝庙中的关公,既非演义亦非正史中的关羽,而是按照后世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理念重新塑造和组合的关公。它已超越国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信仰、一种文化,流播域外。这位另类的关公,承载着现实人们的希望和寄托,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华人维系圈内社会联系和亲情认证以及公共生活的精神纽带。

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对道教和民间信仰以很大的打击,关帝信仰自然也难逃“厄运”。鲁迅先生曾说过,“信仰关帝、瘟将军(瘟神)毫无意义”;钱玄同也指出,“关帝、吕祖、九天玄女与道教有关的一切信仰全是骗人的”[4](p.284)。随着解放后破除迷信诸政策的实施,平日繁盛的诸神信仰渐失往昔风采,然而关帝信仰仍具活力,河南洛阳^①、湖北荆州^②、浙江平湖等地至今仍存有关羽祠庙。坐落于浙江平湖市中心的关羽祠,修建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曰“彰人之扶伦忠义之精神”。平湖乍浦之地乃明清之际中外(特别是中日)通商贸易的重要港口,当地的渔民、航海商人极为信奉关公。笔者曾于此抄录诗一首。诗曰:“衔胆长存义,终身思报国。威风齐日月,名誉震乾坤。忠勇高三国,神谋陷七屯。至今千古下,军旅拜英魂。”宣扬关羽为人尽忠扬义、有勇有谋,教人为善、为真、为美。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也供奉有关帝塑像。对此,曹锦清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讲‘春秋大义’的关羽不知何时被中国佛教徒请到他们的众神殿内的,且中国的道教也把这位儒圣请入他们的神殿。三国纷争,人才辈出,独关羽由将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神,且成为儒、佛、道三教共同供奉的神灵。我不知谁研究过这一‘关羽现象’。在这里,我以为可以了解到我们民族心理与文化的许多重要信息。”[5](p.12)

二、关帝信仰的东传日本

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及有关报道,日本的长崎、横滨、大阪、神户、函馆等地建有大量的关帝庙或关帝堂,其中以横滨、神户、函馆的关帝庙规模最为壮观,影响也最大。日本华侨社区的关帝信仰不仅比东南亚地区早,且其在华侨中的影响也比东南亚地区大[6](p.24)。1692年,《三国演义》日文全译本由湖南文山完成,对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7](p.116)。那么,关帝信仰究竟何时,又是以何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呢?

“行船走马三分命”,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为了乞求航行平安,人们常把象征力量权威的神祇(如关帝)、仁义救助的神祇(如妈祖)作为航船的保护神,我们常常称这些保护神为“船菩萨”。舟山及东南沿海一带直至台湾、香港的渔船上,至今还没有专供船菩萨神龛的圣堂舱。长期以来,通过大陆移民的移居、贸易商人和使节的往来以及文书的流通等传播渠道,中国的民间信仰不断流播日本。以下笔者拟从萨摩、长崎等地的关帝信仰着手,对关帝信仰的东传日本展开论述。

(一) 萨摩等地的中国贸易与关帝信仰的初传

据明郑若曾《日本图纂》五岛图中的“关王祠”的注释可知,当时被王直等人占据的五岛列岛已存在关帝信仰。事实上,位于日本列岛南端的萨摩,从7世纪开始就与中国保持特殊的往来关系,后来往返于中日间的使节船舶及贸易商船多取道五岛列岛。足利幕府时期,为了与明进行勘合贸

① 全国十大商品交易市场之一的河南洛阳“关林市场”,系由关帝庙会发展而成。前述《关羽目录》辑有洛阳关林大门上的楹联。

② 唐·范擘《云溪友议》载荆州有玉泉祠,祭祀关三郎(即关羽);《佛祖统纪》卷六《智者传》所载的关羽显身受戒在当阳玉泉山,今属湖北荆州,当地人奉关公为“伽蓝神”,玉泉山关帝祠庙为中国最早建造。

易,萨摩藩对遣明船加以保护,民间的走私贸易也都经萨摩辗转赴日。萨摩藩对来日的中国人极为优待且不断引诱,或被虏或通商或避难的中国人多居留萨摩。被倭寇俘虏至日的朝鲜人姜沆作《看羊录》载:“岛津义弘据萨摩、大隅、日向等地,近大唐及琉球、吕宋等国;唐船、蛮船往来不绝。来往天朝地方及蛮南者,路必由此。唐货、蛮货充牣市肆。唐人、蛮人列尘比屋。”著名的“唐通事”深见玄岱(即高玄岱)的祖父高寿觉曾“航海寓于萨摩”(《长崎先民传》卷上)。伴随着如此之多的“唐人”(当时日本对中国人的称呼)居住萨摩,中国的信仰习俗也随之而来。《三国名胜图绘十三·高城郡京泊津》载有“宫内村有祭祀八王明神的神社,相传为唐人所建”。八王神社的性质虽然难以明确,但它为唐人建造,应祭祀唐人信仰的神灵^①。即使是中国船被限制在长崎后,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商人至日或归航时多去此神社参拜。

日本《平凡社大百科事典》指出,关帝深受日本人崇敬始于足利尊氏(1305—1358)。据说足利尊氏得梦告向元求军神,把获取的关羽像置于京都左京区真如町灵芝山大兴寺进行祭祀,关帝信仰始传日本[8](p.527)。乍一看,这似乎是无稽之谈,但从当时中日交通频繁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没有可能。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9](p.245,305,460),并对幕府执政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如1246年,镰仓幕府将军源实朝曾听从宋商陈和卿劝告,建造大船欲朝拜明州阿育王山(《吾镜妻》建保四年、五年条);文永、弘安之役时,执政北条时宗就接受过中国僧人祖元的劝慰“血书大经”(《元亨释书》卷八“祖元”条)。自平清盛执政(1159—1181)后,积极推动对外通交贸易,往来于东中国海上的商船除了宋商船外,日人商船也大大增加,据《开庆四明续志》载,有“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足利尊氏于1338年建立室町幕府后,即派遣半官方性质的贸易商船与元进行贸易(即所谓的“天龙寺船贸易”),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他们也大量汲取中华文化。1339年,足利尊氏曾为雕版印刷的《大般若经》写跋附在卷后。而此时的中国,唐、宋、元各朝代的封建帝王均对关羽礼拜有加,不断赐号加冠,儒释道三界乃至民间百姓、商人皆拜祀关公,关帝遂作为武神、扶魔神、财神和结社、会馆的守护神而被神格化。因此,14世纪中叶,关帝作为武神的信仰,随着商人和僧侣的东渡传播日本,并受到足利尊氏等武士阶层的信奉,是完全有可能的。笔者推测,足利尊氏把关帝尊奉为军神进行祭祀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关羽的勇武忠义训导武士们忠君重义——“忠君重义”正是日本武士道的核心。

(二)长崎“唐寺”与华人社会中的关帝信仰

山胁悌二郎先生对现存于世的绘卷“唐船菩萨移居唐寺”——唐人捧着唐船菩萨神体的小道具登陆时的情景——作了如下说明:“货物卸载完毕,唐人把航海中也不断祭祀的唐船菩萨‘移居’唐寺。宿町唐人事务所的会头和职员们也尾随相伴。这称之为菩萨安置,这种热闹场面只有在长崎才能见到。唐船菩萨中,常见的有天后圣母、关帝、关平、周仓等……关帝是《三国志》中桃园三结义之一,被视为护国救民的武神和财神、民族神,在唐人中广泛地被尊崇,关平是关羽的儿子,周仓是关羽的旗手。”[10](pp.299-300)中村质先生也指出,赴日的唐人在货物卸载完毕后,在长崎奉行所职员、佣人和唐年行司等的簇拥相伴下,把船菩萨安置到唐寺,盛大节日举行的祭祀活动由唐寺招请僧人操持,特别隆重。在日唐人的住宅楼房的最高层设有妈祖堂和关帝堂、观音堂[11](pp.311-313)。显然,在此场合下,关帝不仅是武神、护国神,而且还是保佑航运顺利的守护神、使商人发财致富的财神甚至还是维系共同信仰的民族神。

据我国台湾地区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载,日本长崎“建有关庙、天后两处

^① 笔者曾对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系神社进行过探讨,参见葛继勇《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系神社之研究》(2001年9月日本神道国际学会第二届“神道与日本文化”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奖论文)。

庙宇,皆内地商人所造,供奉中国正神”[12](p.133)。长崎最早祭祀关帝的场所为兴福寺,由居留长崎的唐人集团“三江帮”于1623年创建,于寺内的妈祖堂左旁祭关帝;1628年长崎唐人“泉漳帮”创建福济寺,于寺内的青莲堂左旁祀关帝;1629年,唐人“福州帮”创建崇福寺^①,寺内的护法堂祭祀关帝和观音。1678年,长崎华侨“广东帮”创建圣福寺,于寺内的观音堂祭祀关帝、妈祖和观音。其中,关帝在圣福寺的地位最高,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关帝诞祭日,祭祀仪式极为隆重。自1784年起,圣福寺的关帝诞祭日每年增为两次,即在农历正月十三再举行一次。据《丰利船备查日记》所载,1852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浙江籍“丰利”号商船驻留长崎期间,副财副陈吉人(《丰利船备查日记》的作者)等人曾“先在馆内关帝圣殿拈香毕,至公堂同两在留总管往梅崎下船,到圣福寺拈香,乃年例关帝诞也”[13](p.262)。对于流寓长崎的中国人来说,赋予忠、勇、义兼备且在民间和上层社会都享有很高威望的关羽以中华道义和秩序的权威,可藉此为精神支柱,增强凝聚力,维系同胞内部的自治团结。

(三)横滨、神户、函馆等地的关帝信仰

把关帝信仰传播到东日本地区的,是中国僧人心越禅师。心越赴日前夕居住在杭州永福禅院,当时杭州一带对关帝尤为信奉。心越禅师俗兄的夫人乃关氏后裔,心越赴日时曾携去《关帝夫子经》。心越禅师曾于1677年在日本印刷《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并使之流播。据日本祇园寺所藏《初祖杂赞集》可知,1690年4月对关帝进行祭祀后,还把妈祖置于天德寺的关帝堂加以祭祀。《初祖杂赞集》载有“关夫子赞庚子(误,应为庚午)四月末旬作”的诗句。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敬重心越禅师,遂信奉关帝,曾献小宝塔秘藏于寿昌山春德寺。关于春德寺关帝堂,《常陆国名胜图志二·茨城》有记载。其文曰:“关羽庙在寿昌山祇园禅寺内,有关羽像板,押金印施众。”据春德寺所藏的《关帝金印由来记》可知,此金印为关寿亭侯印七组之一,可攘灾生福。据《地中全图》可知,春德寺下的东禅院、传灯院境内建有关帝堂和秽迹堂等具有中国风味的建筑[8](pp.571—572)。

1873年,横滨华人成立中华会馆时,就建造了关帝庙,作为华侨社区共同信仰的中心。《横滨市史》也载有“奉祀关帝,此地华商悉得保护而无恙”的内容。神户关帝庙建于1888年,之后每年农历八月中旬在此举行隆重的盂兰盆会。另据《神户开港三十年史》可知,1893年1月,侨居神户之清人集资建造中华会馆(俗称南京俱乐部),馆内也设有关帝庙,其构造悉按华夏规模。北海道的石狩弁天社保存有“关羽正装图”,函馆的中华会馆落成于1910年12月,位于北海道函馆市中心富冈町。该会馆的建筑外形为关帝庙的造型,图案在宁波和上海设计,工匠及建筑材料也来自中国,还精心地把道教的“劝善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全文雕刻在中华会馆内关帝祭坛背后的木板屏风上。日本侨胞俗称函馆中华会馆为关帝庙,关帝庙遂成为函馆中华会馆的代名词。关帝圣诞与清明节、盂兰盆节一起成为函馆华人的三大节日。关帝圣诞时的祭祀活动,需要由中华振兴商会函馆支部的全体会员参加讨论决定[14](p.37)。关帝除了被尊奉为商业神、财神外,还被尊为象征中华道义和秩序的权威,成为代表整个北海道华侨自治团体——中华会馆的精神支柱。

三、关帝信仰的演变及其影响

民间信仰多是围绕一个或某一群神灵的崇拜、祭祀而展开的,在今天看来就显得有浓重的宗教意识而呈现出很大的负面效应,与时代的进步有所脱节。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面貌,从中还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人们对一个或某一群神灵的崇拜祭祀既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托,又是一种欣赏、一种对美的追求。一般说来,外来文

^① 即非禅师在1657至1668年任该寺住持时,曾特地为护法堂亲笔题写了“威德庄严”和“临下有赫”的匾额。

化——无论是宗教的、民俗的或是别的文化现象——传入某地或外国,必须经过某种程度的改变,以符合其固有文化。关帝信仰在东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发生嬗变。关帝不仅是武神、守护神、商业神,而且被华人奉为中华传统道德秩序的象征,成为华人自治团体——中华会馆的精神支柱;关帝庙遂成为中华会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融入日本本土的信仰习俗之中,成为日本列岛所信奉的“渡来神”,对日本民间信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关帝信仰的演变及其实质

关帝信仰东传日本后,在当地华人社会中普遍深受信奉始于17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明末之际。对不准自由散宿的来航“唐人”来说,在缺乏娱乐的唐人馆内,与祭祀客死的先祖和祈祷航海安全相结合,祭祀关帝也是出于心理上的共同需要。对躲避战乱而寄居异邦的文人、士大夫以及明末遗臣来说,为了消除彷徨苦闷,寻求精神依托,被誉为“护国神”、“民族英雄”的关公比其他神祇更值得信奉,可以此为精神支柱,去强化神权,强化共同的文化信仰,有助于维系中华会馆内部的自治团结。关公能在高耸的摩天大楼与立体影视的异国“安身立命”,且被尊为象征中华道义和秩序的权威,主要是由于关帝信仰根深蒂固于华人故土,伴随着华人迁徙、定居、繁衍而不泯灭,并经历代的传承和衍变,积淀为移民及其后裔稳固的文化心理,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民族信仰的基本框架。

综观关帝信仰在日本的流播,我们可以发现,关帝信仰东传最初是作为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中国商船的保护神——“船菩萨”而零星出现的,主要局限在赴日的中国商人中;此后不久,伴随着中国商人频繁进出长崎等贸易港口,大陆移民(包括僧人)的移居和日本统治者的推崇,逐渐扎根于日本各地的佛教寺院和华人会馆,祭祀仪式也越来越隆重;最后伴随着华人足迹遍布日本各地,并在一般市民中逐渐流播开来,为后人所敬仰祭祀。明治以前,关帝在长崎唐三寺中处于偏殿中的陪神、旁祀的地位,明治以后,关帝成为华侨社会中华会馆——关帝庙的“主神”,天后妈祖、观音则被降至陪神、旁祀的地位。关帝的神性也由守护神、财神以及“反清复明”意识的象征演变为商业神,甚至升华为“象征着中华道义和秩序的”、“至高无上”的神。引起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治以后日本“重商主义”潮流的影响,以及旅日华侨的构成成分、思想观念和经济、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即受“现世利益”的制约影响所致[6](p.31)。

实际上,只有获得现世利益,才能成为信仰的支柱和基础^①。日本的民间祭祀信仰也是如此,天满天神、海神(如住吉神、宗像神、绵津见神)等,都能在民间找到它的受众。在信奉灵物和恪守禁忌的背后,蕴含着中日两国人民的社会功利价值观念。综观关帝信仰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历程,我们发现,各个阶层、各行各业都会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改变神的形象,以利己用,这也是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侧面。民俗(民间信仰)的本质,无论与神有什么密切联系,不外乎是人间的状态。[15](p.206)正因为是“人间的状态”,趋利避害的生存意识才成为民间信仰的价值基础,各种拜神、求神、媚神、娱神、赛神的仪式活动,才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 关帝信仰对日本民间信仰的影响

关帝信仰的东传主要是作为“船菩萨”流入日本,当然,船载而入的还有中国其他的岁时习俗。随着中日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岁时礼俗在一般市民中逐渐流播开来,并波及全日本,日本各地至今

^① 渡边欣雄指出:“汉人社会的民俗宗教,可以说是‘现世利益’的宗教,构成‘中元节’的各种礼仪,都是这类宗教活动的延伸,它们必然伴随着对于人的‘福利’,把‘现世利益’在目前就加以实现,这正是华人文化的特征。”(渡边欣雄著,周星译《汉族的民族宗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还有关帝庙及其遗迹等的存在。事实上,关帝信仰东传日本后,并不只是在当地的华侨、华人社会中深受信奉,也逐渐融入日本本土的信仰习俗之中。足利尊氏曾在大兴寺祭祀关帝,五岛和长崎等地也建有关帝祠庙,宇治兴福寺、水户春德寺等也有关帝堂。另据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研究关帝信仰在东北亚流播的专家山田胜芳先生考证,北海道的石狩弁天社里目前还保存有“关羽正装图”,日本的关帝信仰在华人来此地以前就已存在^①。日本冲绳县也相当明显地保存着关帝信仰,而且根深蒂固[4](p.305)。1966年、1967年,白鸟芳郎教授进行久米村家谱调查时,访问了阮氏家居,发现其家中客厅祭坛的图像中央为关羽绘像,左为先祖牌位,右设神坛,祭祀观音、妈祖等神[8](p.487)。关帝神像位居中央,可见关帝信仰在当地日本民众心中的地位。

关帝祠庙林立于长崎、横滨、神户等地,热闹的关帝祭(关帝圣诞)也深受日本人注目。据《长崎图志》载:“又有关帝祠,五方五帝之像,制极精奇,祷祝甚验。”日本《长崎市史》“风俗篇”特地把圣福寺关帝祭列为专章,作了详尽的记载。明末东渡长崎的福清籍文人俞惟和的孙子、曾担任大通事的俞直俊(1681—1731)刊行的《关帝君遗训》(内容类似道教经典《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原稿真迹,至今仍完好收藏在长崎县立图书馆中,它是当年关帝圣诞祭祀时必须诵读的经文,也是关帝被供奉为儒教和道教神祇、在长崎华人中信奉的事物证据,今已成为长崎县立图书馆珍贵的历史资料。山下青海先生1979年在横滨中华街实地调查时发现,横滨华人信奉的主要是商业神关帝,各家店内均设有神龛供奉关帝,当地华人虔诚地笃信中华街有今日的繁荣是依赖关帝的庇护[6](p.28)。函馆中华会馆是目前现存的惟一纯中国庙宇式样的中华会馆,是当地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在日本新偶像电视剧《正义必胜》中,男女主角(身份为律师)在谈论诉讼案件时,背景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关帝庙,不时有人出入拜祭;庙旁小店林立,门庭若市。横滨关帝庙屡遭战火,多次重建,在1990年8月庆祝关帝庙落成时,神奈川县知事、横滨市副市长等地方政要也前来祝贺。许多辞书如三十五次再版的《年中行事辞典》(东京堂出版)都专门列“关帝祭”条,作为日本比较流行的祭祀活动予以介绍。

宋元之际,关帝作为武神的信仰随着商人和僧侣的往来东传日本,并受到足利尊氏等武士阶层的尊奉,足利尊氏奉关帝为军神,无疑是为了利用关羽的勇武忠义之精神向武士们灌输忠君思想。顺治帝曾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而且每年致祭,备加尊崇,以引导汉人模仿关羽,忠于大清皇朝。由此可见,足利尊氏与顺治帝提倡信奉关帝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关帝信仰,则受到朱舜水、心越等具有大义名分思想的赴日儒家学者和僧侣的影响。朱舜水在赴日之前,曾向关帝庙题联:“许难兴、沛难兴、荆益难兴,止思明万古之君臣”,抒发忠于明朝的不二之心。如果说,足利尊氏崇敬关帝,看重的是关帝武神的神性一面,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信奉关帝,注重的是关公忠君重义的大义名分思想,那么,绚丽辉煌的关帝庙赫然出现于日本新偶像电视剧《正义必胜》中则表明,关帝不仅作为忠义之神,而且还作为“正义之神”而受日本民众的信奉,其已跨越时空,成为日本大众信仰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异域之神”。

关帝信仰的域外流播,使人看到中国民俗文化、民间信仰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然而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即使在农村也很少能见到祭祀关帝等诸神的场所,有逐渐消失的迹象。究其原因,除了思想认识上把关帝等民间信仰斥为封建迷信加以扫除之外,还由于这些信仰“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祭祀中心。而日本的民间信仰如天满天神信仰等都有一个祭祀本殿,并附属有许多神社(神宫),有固定的信徒和捐赠收入。在思想意识上,日本人不但不视此为迷信活动,而且还认为崇拜、祭祀神灵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他们看重的是关帝信仰净化人心、教化社会的影响力。中日两国由于彼此地理接近和长期历史交往等原因,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是相当广泛而深远的。探讨中日两国的民间信仰、民俗之间的交流融合,不也是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者的一种“对美的追求”吗?

^① 其论述载于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网(<http://www.city.ishikari.hokkaido.jp/hakubutushi/ha.012.htm>)。

(本文执笔之际,承蒙历史系何忠礼教授的不吝赐教,谨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乔继堂. 中国岁时礼俗[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李祖基. 论《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的形成[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 (4): 43 - 47.
- [3] 朱大渭. 武将群中第一人[A]. 卢晓衡. 关羽、关公和关圣[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7 - 49.
- [4] [日] 窪德忠(萧坤华译). 道教史[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5]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6] 童家洲. 试论关帝信仰传播日本及其演变[J]. 海交史研究, 1993, (1): 24 - 31.
- [7] [法] 沙梦(颜保译). 中国传统文学在亚洲[A].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中外关系史译丛: 3[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104 - 131.
- [8] [日] 李獻璋. 媽祖信仰の研究[M]. 東京: 泰山文物社, 1979.
- [9] [日] 木宮泰彦(胡锡年译). 日中文化交流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0] [日] 山崎悌二郎. 長崎の唐人貿易[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95.
- [11] [日] 中村實. 近世長崎貿易史の研究[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94.
- [12] 郭松义. 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J]. 中国史研究, 1990, (3): 127 - 139.
- [13] [日] 松浦章(冯佐哲译). 中国商船的航海日志[A].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218 - 268.
- [14] [日] 許淑眞. 函館における福清幫[A]. 飯島涉. 華僑・華人史研究の現在[C]. 東京: 汲古書院, 1999. 18 - 48.
- [15] [日] 白川静(王巍译). 中国古代民俗[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何海峰]

The Formation of the Belief in Guandi and Its East Spread and Effect on Japan

GE Ji-yong¹, SHI Meng-jia²

- (1. *Institute of Japanese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t is good to adopt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exchange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and belief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elief in Guandi and its east spread. Forme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belief in Guandi spread widel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dvocated under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eligious belief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Followed by people in China, it went abroad with overseas Chines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as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monks and businessmen made travel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Japanese trade in Nagasaki and the east emig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belief quickly spread into Nagasaki and other parts of Japan. Not only did it flourish i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hus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received popularity from the Japanese samurai class, Confucius scholars and common people. Thus, Guandi became the foreign God in the Japanese religious culture.

Key words: belief in Guandi; introduction into Japan; evolve; influence; cultural communication